

# 近十年元代诗文研究述要

邱江宁 唐云芝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一直相对薄弱的元代诗文研究有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和优秀学者快速成长。围绕文献整理与研究,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诗文理论与批评,地域文化与文学,文人群体以及文学史撰写等内容,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

**关键词** 元代诗文 《全元文》 《全元诗》

邱江宁,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教授 321004

唐云芝,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321004

与上个世纪元代诗文研究相比,近十年来元代诗文研究取得的成绩已不可同日而语。元代诗文研究的热兴,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纵深发展的结果,更是元代文学研究者打破传统观念、开阔研究视野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份自主选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1985年,隋树森先生发表《元代文学说略》一文,指出研究者多致力元曲研究,对诗文注意不够,今后应该加强元代各体文学研究<sup>[1]</sup>。这一观点在90年代成为元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1990年,由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正式立项。1991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主持召开全国首届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李修生先生强调,要全面把握元代各体文学,对一直以来被学界忽视的元代诗歌、散文、词赋等都要展开专题讨论。同年12月,由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此书被赞为填补元代诗文研究“学术空白”之力作,诗文所占篇幅达到全书1/4以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元代文学史著撰写元曲独尊、诗文式微的态势。这一会一书“对90年代的元代文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导向作用”<sup>[2]</sup>,这其中最鲜明的导向便是:打破元曲独尊,关注元代诗文,开拓元代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

新世纪以来,元代诗文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特别是以杨镰先生为代表的元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2年,杨镰先生以《贯云石评传》踏入元代诗文研究领域,1998年出版《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2002年,杨镰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元诗与元诗文献研究”立项,此后,围绕课题内容,杨镰先生陆续发表多篇相关论文。2003年,杨镰先生出版《元诗史》,2005年又出版《元代文学编

[1]参见隋树森:《元代文学说略》,[北京]《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2]参见查洪德:《二十世纪元代文学之宏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6期。

年史》。在杨镰先生的引领和带头实践下,元诗(研究)成为显学的趋势已经出现<sup>[1]</sup>。

相比而言,这个时期的元文研究不如元诗研究令人注目,既没有专著出现,专题论文也不多。不过,随着2004年底,《全元文》60册的尽数问世,元文研究的薄弱情形很快大有改观,围绕《全元文》补遗、辑佚、校读陆续出现文章数量相当可观。诚如查洪德先生所言,《全元文》的出版成为“新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sup>[2]</sup>。这块基石不仅奠之于元史研究、元代文学研究之下,更直接推进了元代诗文研究的加速展开。在《全元文》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元代诗文研究的优秀学者、研究新锐以及研究团队蓬勃兴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与之前零散的研究局面相比,近十年来的元代诗文研究正朝着规范、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

1. 元代诗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近十年来,元代诗文研究的蓬勃兴起是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开启的。首先,基本文献古籍整理成果突出。自2005年《全元文》出版之后,围绕《全元文》的辑佚、文献深入整理工作,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所联手吉林文史出版社整理出版“元人别集丛刊”系列本,至今共出版元代诗文作家文集50余种,涉及元代诗文作家60余位,诸如程钜夫、许衡、欧阳玄、马祖常、袁桷、贝琼、张之翰、贡奎、贡师泰、吴师道、张养浩、胡祇遹、傅若金、陈基等。除北师大集中进行元代作家别集整理之外,浙江古籍出版社相继出版一系列浙江籍元代作家如柳贯、杨维桢、赵孟頫、王冕、黄潘、乌斯道、刘基、张可久等人的集子,西泠印社出版了元代画家如赵孟頫、王冕、倪瓒等人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杨亮整理校注完成《袁桷集校注》、《王恽全集汇校》,王颀点校整理《虞集全集》、《黄潘全集》,查洪德点校整理《姚燧集》等,这些作家乃元代著名馆阁作家,作品多、涉及面广,意义重大,但相应整理点校工作量也非常大,值得敬佩。此外,叶爱欣完成《迺贤集校注》、徐永明点校整理《郑元祐集》,杨镰整理出版《玉山雅集》等等,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2013年5月,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出版,全书包括索引共68册,是暨《全元文》后元代基本文献整理的一大盛事,它的出版对元代诗文的深入研究意义深远。

其次,文献资料的再整理成果丰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有《辽金元名人年谱》和《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两种,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汇录元诗话245家,刘达科先生《辽金元诗文史料述要》(中华书局2007年)不仅辑录各类相关文字形态史料,还汇集了体现辽金元诗文思想的本时期人所编前代诗文集及各种诗文评撰著、资料汇编等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2009年由傅璇琮先生总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金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著录金元时期作家别集188种,较《四库全书》新增17种,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目录索引。刘景毛、江燕《元代滇诗辑注》(云南科技出版社2013年)选入元人与云南这一地域相关的所有诗作,汇编角度独特。杨讷先生《元史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4年)、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卢勇先生《元代吴镇史料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汤麟先生《中国历代绘画理论评注·元代卷》等著亦辑有相关诗文史料。另外,由邓绍基、杨镰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中华书局2006年)为元代诗文作家的基本生平提供了较有价值的文献参考。

最后,文献研究工作有效跟进。王树林《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与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两书对元代诗文文献皆有溯源探流、查漏补缺、辨伪存真之工,可算此类成果的专著代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一些高校硕士学位论文也每每以元代作家生平文献整理作为论文,一部分论文为戴良、张雨、吴师道、欧阳玄、张养浩、袁桷、苏天爵、郝经、王恽等人作年谱。此外,元代作家交游考一类的整理也成为一些高校硕士论文较为青睐的选

[1]参见《元诗成为显学的趋势已经出现:对“元诗与元诗文献”课题主持人杨镰研究员的专访》,〔北京〕《学术动态》2004年第9期。

[2]参见查洪德:《全元文:新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

题。目前粗略统计出的相关论文约80余种,其中超三分之一是对元代诗文作家年谱、交游的研究。

2. 社会文化与元代诗文研究 关于元代社会文化与元代诗文创作的关系研究,近十年来,“多元文化交融”成为重要关键词,并因此出现一批视角独特、观念生新的成果。张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一编指出:“元灭南宋实现‘混一’后,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元代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有别于分裂时期的新风貌”,“对文学与艺术来说,开放永远比禁锢好,多元永远比一元好。不同文化的融合带来的元朝文学艺术的独树一帜,造就了灿烂辉煌的元曲,传统形式的元诗和元文也蔚为大观。”<sup>[1]</sup>这一观点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具体阐释。2005年云峰先生出版《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在大文化背景下分别论述了蒙汉文学中诗歌、杂剧、散曲之关系;之后,云峰先生又以民族文化交融为研究视角,通过大量个案来展示元诗中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与汉族文化因子在诗歌中的相融共生的创作特征,出版专著《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杨镰先生撰文认为,“蒙古、色目人使用双语,选择以汉语写作,是元代文学与文化的特点”,“元代双语文学现象和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2010年,杨镰先生的“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在谈到这一选题的意义时,杨先生指出:“从西域诗人群体到双语文学现象,从文学家的个案研究到定居中原的蒙古、色目双语文学家族,是一个艰巨、持久的积累、探索过程。这一课题涉及了文学、历史、文化、民族、文献、人文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不但对研究者自身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也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瓶颈’。双语文学现象、双语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的确立,则体现出一个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的研究者以及学科本身的进展。”<sup>[2]</sup>可以说杨镰先生的思考为元代诗文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其研究成果令人期待。2013年邱江宁出版《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该著下编即围绕“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多民族特征与元中期文坛的南北融合”,从多民族、南北融合的文化语境中勾勒出元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在论文《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的江南书写》中,邱江宁以元代“江南书写”这一文学现象为多民族文化融合媒介进一步指出,元代“南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才是江南文化品味提升的关键因素”<sup>[3]</sup>。

围绕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社会文化背景,近十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元代诗歌创作中的“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特色。关于“胡人汉化”问题,尹晓琳的专著《辽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以及毕塞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毕兆明《论蒙汉文化交融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影响——以泰不华汉文诗用典为例》、叶爱欣《多元文化背景下葛罗禄贤的诗歌创作》、黄鸣《元代葛罗禄族诗人迺贤诗风考论》、秦琰《元代色目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等论文都有专门探究。而关于“汉人胡化”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对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中。李军《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强调了上京纪行诗的文献价值,而杨富有则凭借对上京纪行诗的专题探究在2011年以“元代扈从诗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此后围绕该课题,杨富有发表一系列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论文。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边塞诗的发展》(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将上京纪行诗定义为边塞诗,并对之作纵向深入的探究。而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认为上京纪行诗作为反映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诗歌创作,是“元代诗歌创作中最值得记写的主题”,对元代诗风变革、诗题拓展、诗体革新等有着不容忽视的诗史意义。

另外,近十年中史学学者萧启庆先生对元代社会文化研究推出一系列成果,指出:“元朝中期以后,一个人数虽不庞大,却是日益扩张的蒙古、色目土人群体业已成立。此一异族土人群体并非孤立

[1]傅璇琮、蒋寅总主编,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第397页。

[2]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镇江]《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邱江宁:《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的江南书写》,[北京]《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于汉族士大夫阶层之外,而是与后者声气相通,紧密结纳,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各族间共同的士人群体意识业已超越种族的藩篱,遂行成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sup>[1]</sup>萧氏这一探究视角对元代文学研究颇有启发,刘嘉伟《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尚清诗风》(《文学评论》2011年04期)和张建伟《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04期)等论文都吸收了萧氏的研究成果。

3. 理论批评与元代诗文研究 近十年来的元代诗文批评研究大致承继了上个世纪以来的方向,涉及到具体研究,则主要围绕两大热点展开,一为理学与元代诗文理论的关系、一为元代诗学的“宗唐”问题。

关于元代理学与诗文理论的关系问题,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认为理学全面影响元代诗文,在其参与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中,他特别强调,元代理学“在元代意识形态中占有主流地位”,“对诗文的影响最为明显,最为深刻”<sup>[2]</sup>。张红也认为:“整个元代,理学与文学呈相融相济之势,理学家既注重文采,文学家亦多以理学为底蕴,重涵养,尚教化。二者交融渗透,成为元代学术、文学的一大特征。”<sup>[3]</sup>2014年查洪德先生《元代诗学通论》出版,全书对元代诗学作全面梳理,既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sup>[4]</sup>。元代文章批评方面,祝尚书《宋元文章学》(中华书局2013年)和高洪岩《元代文章学》皆专注于元代文章学的探究,认为元代文学家在创作中“将理学的性理与古文的辞章相结合而形成了元代经世致用古文特色”,“尽管他们没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宗旨的文学流派,但他们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的倾向已经为明代宗法秦汉和宗法唐宋的复古派奠定了基础”<sup>[5]</sup>,有填补元代文章理论研究空白之意义。魏崇武《理学传播与蒙元初期散文观的嬗变》(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则从理学角度审视了元初散文观念的变化。

元代诗文理论研究的另一大热点问题是元代诗文批评中的“宗唐”倾向研究。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在梳理元代唐诗学的整个发展脉络之后认为:“元代诗学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也是自唐入明的门户。”<sup>[6]</sup>蒲宏凌《关于元诗》认为,明人宗唐风气“更是受到元代诗坛创作趋向的直接影响”<sup>[7]</sup>。王辉斌在其《宋金元诗通论》一书中认为元代诗人宗唐侧重于艺术形式方面,“在元诗的发展史上就具有积极意义”<sup>[8]</sup>,并能“宗唐而变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sup>[9]</sup>。而吴国富、晏选军《元诗的宗唐与新变》认为元诗理论上主张宗唐,但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元人的生活已被历史改变,“元诗之新变亦由此而生”<sup>[10]</sup>。查洪德先生认为“元人论诗,有主唐的倾向,但并非举世宗唐。元代诗论家的理想,是广学各家,兼取众长,在学唐宋中超越唐宋,形成既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宋的元人风格”<sup>[11]</sup>。相关研究论文如史伟《元诗“宗唐得古”论》、云国霞《元代诗学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也颇有深入讨论。

上述两大热点问题之外,近十年来的元代诗文批评研究,所论议题还涉及诗文之理、气本论、元诗性情学、杜诗学、风格流派研究等多个方面。王忠阁《延祐、天历间雅正诗风及其形成》、《元初北方

[1]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页。

[2]傅璇琮、蒋寅总主编,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第279页。

[3][6]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0页,第11页。

[4]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洪序一,詹福瑞序二,二序中皆有此论。

[5]高洪岩:《元代文章学》,〔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6页。

[7]蒲宏凌:《关于元诗》,〔北京〕《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8]王辉斌:《宋金元诗通论》,〔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45页。

[9]王辉斌:《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宜昌〕《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0]吴国富、晏选军:《元诗的宗唐与新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4页。

[11]查洪德:《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太原〕《晋阳学刊》2013年第2期。

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探讨了元代诗风,许结《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李新宇《论吴莱的辞赋理论与创作》和徐志啸《唐宋元赋学论》展示了元代赋学成就,晏选军《元代文坛“延祐极盛”说辨析》、熊江梅《延祐文人集团文论思想研究》分析了延祐文论,胡正伟《〈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及王奎光《元代诗法研究》、杨匡和《元人诗序研究》则对具体的元人诗话诗法作品作了相关阐释。

4. 文人群体与元代诗文研究 近十年以诗文作家群体为分野进行元代诗文研究成为一个突出点,并常钩连对文人心态、地域文化的研究,这其中,馆阁文人群、遗民文人群、玉山雅集文人群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元代馆阁文人群研究在近年元代文人群体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2006年,叶爱欣发表《“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文人活动考》(《平顶山学院报》2006年06期),以“雪堂雅集”为线索分析了至元馆阁诗人群体的形成和文学活动,并指出“元世祖至元年间,一个以馆阁文人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已经形成,并开始活跃于元代诗坛之上,支撑着元初诗坛局面,维系着诗坛命脉,引领着元代诗坛的走向”。杜改俊《论元初金莲川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文学遗产》2008年04期)考察了金莲川潜邸文人这一特殊的元初馆阁文人群的文学成就,认为这一群体在历史与文学史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博士论文《跨文化视角下忽必烈幕僚集团形成研究》(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更开阔的视角探究了这一群体的三大形成途径。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之文学研究》(2010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亦认为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创造了元初北方文坛的繁荣,深切影响整个元代诗文的发展。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首次对奎章阁文人、文风与元代文坛的关系进行了评述,认为奎章阁“汇聚了元中叶以来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在元代文坛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sup>[1]</sup>。2013年邱江宁出版《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两部专著,在提出“奎章阁文人群体”概念的基础上对奎章阁文人的来龙去脉、定义发微以及与元代中期诗文关系进行综合,认为该群体是研究元代中期诗文“无法绕越”的创作群体。而唐朝晖《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华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郭鹏《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的先导作用》(《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第2期)也认为奎章阁文人对元代诗学意义不同寻常。另外,李超在讨论江西文人群体的系列论文中,也认为“有元一代文坛,馆阁文人在主流文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江西籍文臣是馆阁文臣中重要的一支”<sup>[2]</sup>。

近十年来,文人心态研究糅合着地域文人群研究有较深入的进展。与上世纪著名的元代文人心态探究专著《元代文人心态》的普泛全面论述相比,近十年来元代文人心态研究每每以某个群体为核心来深研细挖元代文人的婉曲心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饶龙隼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2008年第5期)和左东岭2009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玉山雅集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其诗学意义》(2009年第3期)。饶氏认为“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普遍抱持择主心态”,“这心态游移于朝廷与乡园之间,以仕途困厄和乡园适意相对照。它上接元末择主心态,是择主心态的一种变衍,而根源就在浙东‘正学’”;左氏文章通过对元末玉山雅集性质的考察,认为它“体现了元末之际文人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这种生命存在方式决定了当时诗歌的才力竞赛性质与作者私人化情感抒发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其纤巧秣丽的体貌”。另外,元初遗民心态问题也是文人群体研究的一个侧重点。唐朝晖《元代理学与元遗民文人群心态》、陈彩云《元初温州的遗民群体》、刘静《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分化及原因寻探》、任红敏《文化遮蔽下的宋元遗民及其遗民文学》和杨亮《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等论文或侧重诗文成就、或针对心态、或综而论之,既对元初文人心态的关注更加深切,又对元初遗民群体的探究

[1]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北京〕《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李超:《江西籍文臣与元代盛世文风的推阐——兼谈对江西文风的改造》,〔哈尔滨〕《文艺评论》2014年第2期。

更为具体。

另外一些具体地域的文人群体研究也卓有成效。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和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二书皆采用考证与义理兼重的学术思路,前者对元代至明初婺州地区文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究,并为黄溆、胡助五人编制了年谱,后者在以袁桷、戴表元等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宋末元初四明文士作有群体考索,并编撰四明文士活动年表。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花木兰出版社2012年)对元代大都文人群有所关注。此外,一些博士论文如彭茵《元末江南文人风尚与文学》、王魁星《元末明初的浙东文人群研究》、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家族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罗海燕《金华文派研究》、施贤明《元代江南士人群体研究》等,在具体进展中,虽着眼点在江南区域的文人群,但往往能注意到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合背景中元代地域文人群的独特内容,并带给人们一些不同的文献勾稽视角和探究思路。

在文人群体研究取得相当进展的同时,一些元代作家个案研究也颇值得重视。《“汉庭老吏”虞集》(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和《松雪斋主:赵孟頫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及着眼于作家文学成就之著,主要有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中国出版集团2005年)、杨光辉《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姬沈育《一代文宗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刘飞《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齐鲁书社2010年)、刘竞飞《赵孟頫与元代中期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个案研究成果极大推进了元代诗文研究的整体发展进程。

5. 科举制度与元代诗文研究 从科举视域审视文学创作在其他朝代早已进展得相当深入,而元代立朝八十年不设科举的事实使得相关研究进展一直缓慢,但在近十年来有较大突破。2007年,黄仁生撰写《论元代科举的行废与辞赋的演变》<sup>[1]</sup>从元代科举制度行废背景考察元赋的发展态势。2008年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出版萧启庆的专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此书虽非文学研究类著作,但在考察元代科举之际,注意到元代科举与其他各朝的不同,特别考察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之影响,以及各族群之间的社会文化互动。许结《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06期)就科举与辞赋经典化关系,指出元人考赋倡导“祖骚宗汉”、“变律为古”,具有树立或重建经典的意义。吴志坚《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2009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认为元代科举对理学和辞章的重视,是当时文坛“辞章派”和“理学派”不同意见的折中,也是元代“道文合一”思潮的一股强大影响力。李文胜《论延祐科举与元中期的雅正文风》与《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两篇文章皆就“延祐科举”这一特定历史举动,讨论了延祐科举对文人心态的改变、对馆阁文风的成熟以及对元代中后期的文学面貌建设的重要文学史意义。张新科《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认为“元代科举引起了文人学士对汉赋的重视,对于汉赋的经典化起了较大作用,并且对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亦产生较大影响”。李新宇《论元代考赋制度的变迁》(《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则从具体的考赋制度看元赋创作,认为“‘祖骚宗汉’之写作范式与批评思想的完成,标示出元赋在整个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牛海蓉《元代辞赋南北差异、变化融合和历史趋向》(《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夏之卷)从南北融合角度讨论科举与元赋创作的关系。2013年,余来明的《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是“第一次深入地对元代科举与文学关系展开研究的著作”,“在对元代科举制度的历史特点和兴废变迁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对元代科举与士人心态的变化、士人群体的兴替、元代文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风貌、文学思潮的变迁、文学活动形态的变化、文学地域

[1]此论文来源于《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82页。

的迁移等问题展开研究,在厘清科举制度与文学演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为元代文学的研究和理解提供了新思路。”<sup>[1]</sup>总之,从科举视角进行元代诗文研究不仅对深入探究元代诗文创作特色意义深远,而且也为元代诗文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域。

6. 文学史与元代诗文研究 随着元代诗文研究的推进,关于元代诗文文学史价值的重新考量逐渐成为人们研究转型的关键。杨镰先生《元代文学编年史》中认为:“元代并不是传统的文体诗文的衰退时期。在元代,作家最多,作品最多的,仍然是诗文。而元代诗文与前朝相比,普及程度更高,涉及的范围更广。诗文成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凝聚力的体现。”<sup>[2]</sup>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元代文学》中,杨先生认为“元诗是在对宋诗的反思中发展的”,“元诗发展的过程,就总体上说,却是诗歌的抒情性回归的过程”<sup>[3]</sup>。张晶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称元朝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不仅元诗数量很多,而且出现了一批卓异的诗人”,元代散文“一直在反奇崛与靡弱两种倾向中发展,融合南北之长而去其短的结果,又为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导向”<sup>[4]</sup>。余来明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虽以文献整理演绎元代文学历史流程,但编者却力图展示元代诗文发展的不凡气象。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亦认为元代“诗从宋代的主理向主情回归,而且较唐代更强调自我的作用;文章也开始向抒写性灵的方向倾斜”<sup>[5]</sup>。2012年出版、由赵敏俐和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更认为元代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就诗坛而言,元人诗歌呈现众派汇流的特点,而且对于唐宋诗来说,有着深层的发展,和文化上更多的包容性,因而,也就成为中国诗史上的又一座高峰”<sup>[6]</sup>。2013年,翟鹏在《民族文学研究》发表《新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的审视与思考》,在对元代各体文学在新世纪的5种文学史著中所占比例进行考察之后,认为人们正在打破偏见、重新定位元代诗文的文学史意义。但正如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所指出的那样:“元诗在汉人文学胡化和胡人文学汉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放射出特异的光芒,却又在规行矩步中消磨锐气,甚至还徘徊在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的圈里圈外。元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没有完全舒展、稳定和成熟的‘过程’,它作为过程的意义,甚至大于它作为精品的存在。”<sup>[7]</sup>

元代诗文研究近十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诚如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提出的学术思路所云:“元代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的语境,元朝作为蒙古族,从北方入主中原统一了中国,震撼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元诗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是它学唐诗宋诗的程度怎么样,而是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就存在一个胡化和汉化的问题。”藉由杨义先生的思路,倘若将“边缘活力”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志史乘、口头文学”<sup>[8]</sup>全面纳入元代诗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之列,则元代诗文研究必将有更为宏阔的前景。

[责任编辑:平 啸]

[1]任红敏:《元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与深度挖掘——读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安阳〕《殷都学刊》2014年第6期。

[2]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杨镰主编:《中国文学通史·元代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4]傅璇琮、蒋寅总主编,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第242页。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6]赵敏俐、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6页。

[7]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39页。

[8]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页、第80页。